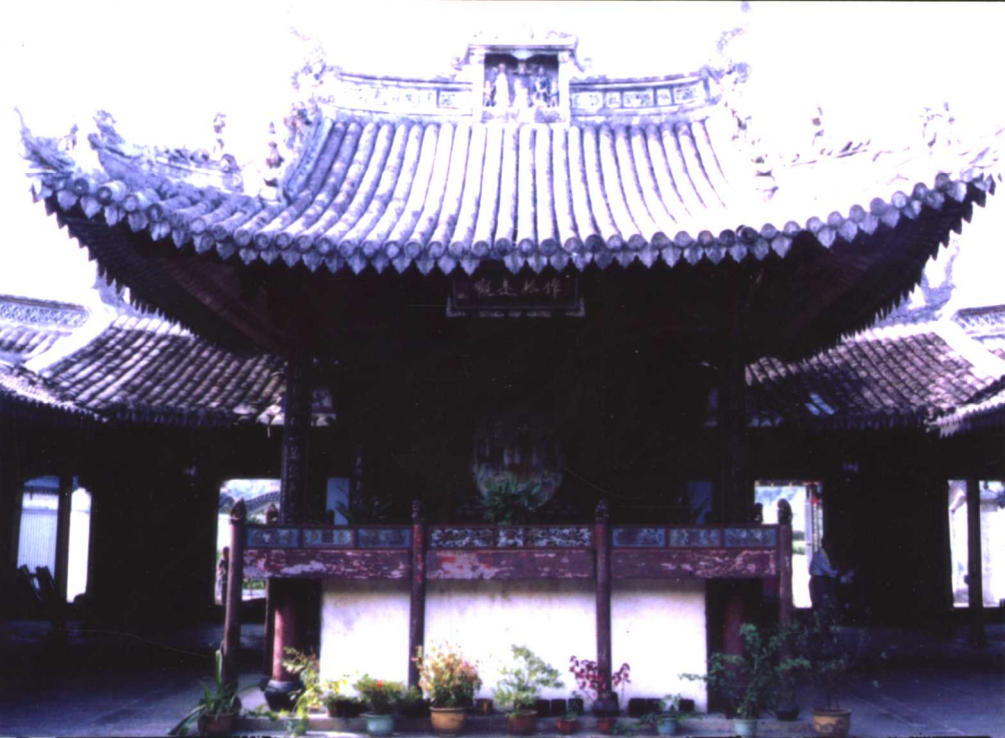




Traditional Folklore
and Culture
in Pingyang and
Cangnan Counties

平陽縣
傳統民俗
文化研究
蒼南縣

主編：徐宏圖 康豹

民族出版社

Traditional Folklore
and Culture
in Pingyang and
Cangnan Counties

平陽縣
蒼南縣
傳統民俗
文化研究

主編：徐宏圖 康豹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徐宏图,康豹主编.—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5.4

(浙江传统社会丛书)

ISBN 7-105-06917-1

I.平... II.①徐...②康... III.①风俗习惯—研究—平
阳县②风俗习惯—研究—苍南县

IV.K89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61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7.125 字数:42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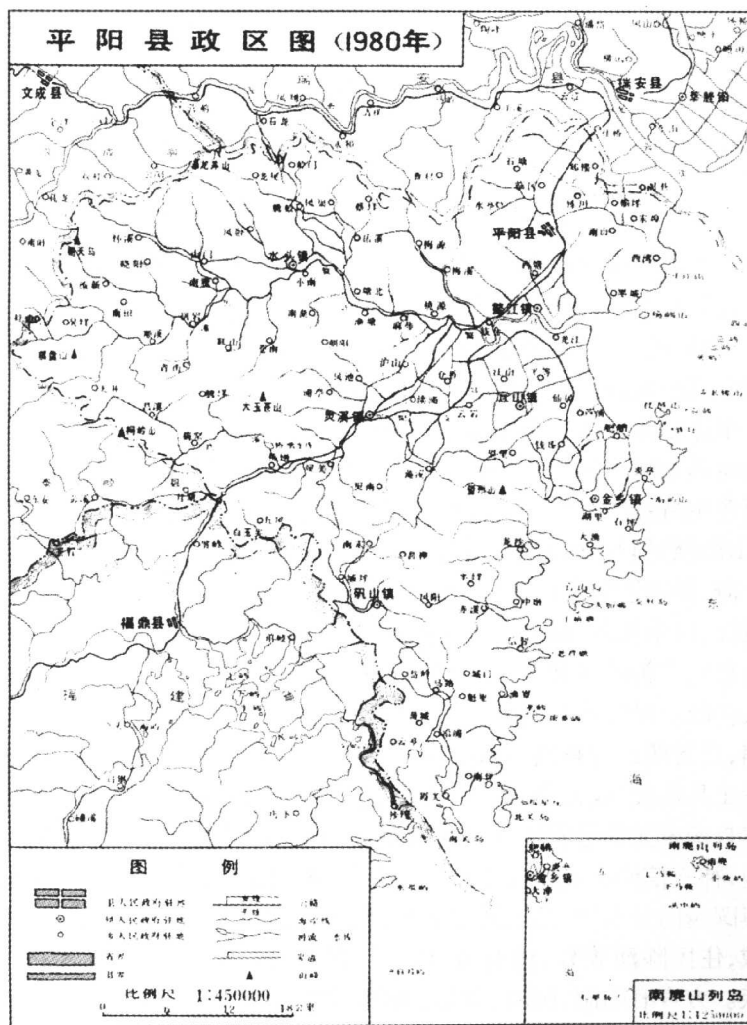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29.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錄

導 論	徐宏圖(2)
平陽縣、蒼南縣概述	徐宏圖(32)
平陽縣城關的廟會與醮會	周 干(63)
平陽縣錢倉城隍廟會	張 奮(104)
平陽懷溪鄉泮溪宮“五顯爺廟會”	徐兆格(139)
平陽傀儡戲與廟會	徐兆格(171)
平陽縣騰蛟鎮忠訓廟廟會	白洪祉(209)
平陽縣騰蛟忠訓廟傳統醮會與普度	白洪祉(257)
平陽縣南雁蕩山的朱仙姑信仰	徐祥地(316)
平陽縣的溫瓊信仰及其相關儀式	徐宏圖(370)
平陽縣的陳靖姑信仰及其降妖儀式	徐宏圖(402)
蒼南縣蒲城“拔五更”習俗 ——2002年正月迎神賽會活動紀實	金亮希(434)
蒼南縣蒲城姓氏研究	金亮希(500)
後 記	(543)



平陽縣政區圖(1980)

導 論

徐宏圖

本書所收均爲平陽、蒼南兩縣學者所寫的有關舊平陽縣民俗文化的論文。我們的研究計劃之所以選擇舊平陽，是由于它的歷史、地理環境、社會經濟結構比較特殊，民俗文化遺產特別豐富。據《史記》載，這裡古屬東甌，開發比中原遲，至西周仍爲氏族社會，從事原始漁獵與農業生產；秦始皇雖征服東甌，但并未派人管轄；漢時爲東甌王領地，却又不直接受漢統治，可見其歷史之特殊，因而產生特殊的風俗，如“鬻髮文身”、喜吃蛇、蛤等。從地理環境看，《山海經》稱其“居海中”，其實是“依山臨海”，既獲利于海，又受害于海，長期受海潮的襲擊，天災人禍不斷，以至造成人畜溺死、浮尸蔽江、田禾無收、瘟疫橫行的慘狀，故當地居民對海特別敬畏，以晏公爺爲主神的海神廟即“晏公殿”，舊時蒼南隨處可見，有的至今香火仍旺。從經濟結構看，長期以來分爲漁狩與農業兩大塊，自產自銷，爲封閉式的自然經濟結構，古時采用“水耨火耕”的耕種法，生產工具落後，收入微薄，生活窮困，祈求神靈恩賜的觀念特別強，雖然自南宋尤其是明代以後已逐漸改變上述的格局，但發展依然緩慢，神靈信仰之風仍舊濃厚。總之，這裡地處浙、閩交界，是古甌越與閩越的分水嶺，爲東甌王的轄地，是多民族雜居、多方言混雜區域，住民除漢族外，尚有畚、回、壯、滿、蒙古、土家、侗、瑤、布依等族。方言有甌語、閩語、畚語、蠻語、金鄉語等。自宋代以後，既有北人南下，帶來中原之風；也有南人北上，帶來閩南之俗，南北民俗于此處交融，如蒲城龍王廟神龜令源于中原的龍王塑像與來自閩南的陳靖姑塑像并排坐着就是一例。又由于這裡偏于東南一隅，

長期交通閉塞，傳統民風少受沖擊而保存完好，因而被中外民俗學家視為研究中國民俗文化的一塊難得的寶地。

正因為如此，所以很早就引起人們的關注與研究。據明姜維《岐海瑣談》卷七載，張文忠（孚敬）修嘉靖《溫州府志》時就指出平陽風俗“失其鄙”。該書還記錄忠靖王“溫元帥”在平陽一帶的信仰習俗。（1）清乾隆年間，平陽張綦毋的《船屯漁唱》寫有 100 首竹枝詞反映當地不同的風俗，其自序曰：“平陽故橫嶼，船屯也。志創于元初，後代有增修，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泛覽之暇并及謠俗所傳綴為韻語一百首，敢附采風之作，聊備榜人之歌云爾。”第 58 首還對平陽縣當時存在的某些陋俗表示關注與感嘆道：“自來習俗最難醫，相國高論不可移。唯有平陽失之鄙，鄙了之意欲何為？”（2）所謂“相國高論”云云，即指上述張文忠對平陽風俗的看法。1893 年，英國人孟哥梅里（P. H. S. Montgomery）所著的《溫州方言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提到平陽俗語“老人客（婦女）”。（3）1933 年，王虞輔等所著《平陽畬民調查》首次對平陽畬族的風俗進行記錄，稱其“居山頭，刀火耕。早到晚，男女種。一畝田，幾十斤。冷水田，冰心腸。點白鹽，食茹糧。蓋棕衣，住草寮。穿苧衫，光腳板。想錢用，常狩獵”云云。（4）1958 年，陳承融所著《平陽方言記略》是關於該縣方言最早的普查報告。（5）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平陽縣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平陽縣故事、歌謠、諺語卷》、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新編《平陽縣志》與《蒼南縣志》、葉大兵《俗海探微》、鄭維國與鮑克讓編《蒼南民俗》、周祝偉與林順道等著《浙江宗族村落社會研究》有關平陽部分等。

浙江是民俗文化大省，從出土的文物得知，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時期，先人們就在圖騰崇拜中創造了“雙鳥朝陽”的鳥圖騰文化。降至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又創造了中國最早的包括驅鬼、逐疫、酬神、喪葬、祈願等儀式在內的儺祭文化，這從良渚出土

的玉琮上刻有最早的傩面具圖文“饕餮紋”得以證實。(6)傩文化至清代尚在溫州平陽一帶盛行，清方鼎銳《溫州竹枝詞》有所謂“迎神賽會類鄉傩，磔攘喧闐滿市過。方相儼然司逐疫，黃金四目舞婆娑”可知。(7)以目連救母為題材、于中元節盂蘭盤會期間演出的目連戲及其習俗，雖然出自中原，但其發祥地却在浙江，浙江至今尚保存有六種傳自明代的目連戲劇本。(8)其中《破地獄》一折尚在東陽農村喪葬儀式中演出。(9)《破血湖》于民國時期尚在平陽城關喪事中演出。(詳後)其他如生產民俗、生活民俗、禮儀民俗、節日民俗、信仰民俗等，浙江亦十分富贍。浙江的民俗研究，近代當推鐘敬文為泰斗。1928年，鐘先生執教浙大期間，會合錢南揚、江紹原等在《東南日報》上創辦《民俗周刊》，後又在《藝風》月刊上創辦《民俗園地》及專號，至1930年夏秋間，在杭州正式成立中國民俗研究會。近年浙江的民俗研究，成績亦頗著，除出版民間故事、歌謠、諺語、舞蹈、曲藝、民歌、戲曲等集成外，還編纂出版《浙江風俗簡志》、《浙江民俗》、《浙江民俗大觀》等著作。筆者自1991年應邀參加臺灣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與1996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以來，便把中國戲曲與民俗結合起來研究，深入磐安、東陽、紹興、上虞、麗水、金華、永康、平陽、蒼南等農村，作了長達15年的田野調查，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先後在王秋桂教授為主編的《民俗曲藝叢書》與新文豐出版公司等，出版有關浙江傩戲、目連戲、孟姜戲、夫人戲、醒感戲、陳靖姑與“溫元帥”信仰、道教閩山教、道教科書匯編等16部專著、20多篇論文。美籍民俗學家康豹教授還用英文將我的論著向西方的學術界作了介紹並給予較高的評價。其中涉及平陽、蒼南民俗文化的有專著《平陽東岳觀道教音樂研究》以及與薛成火先生合作有關道教閩山派“度關”、“皇君落場”科儀的論文多篇。

對比以往的研究與寫法，本論文集一個鮮明的特點是，每一篇

論文都是作者經過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在充分掌握資料和案例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本研究計劃開始于 2001 年秋，曾得到法國遠東學院與浙江社科聯的資助，在平陽、蒼南兩縣文化局的領導下，在勞格文、康豹教授的親自指導下，通過 8 位作者的通力合作和長達三年的實地調查才完成的。勞格文(Professor Lagerwey)系法國遠東學院教授、著名的漢學家，是本研究計劃的主持人，主編出版《客家傳統社會叢書》達 20 種，本論文集的作者就是以這 20 種叢書為範本而開展田野調查的，因此本論文集具有以下三大特征：首先是資料翔實。除盡可能多地掌握文獻資料外，每一篇論文都有自己的田野點，通過對田野點的反復、不厭其煩地調查與記錄，往往獲得十倍至數十倍于論文的資料，為立論提供詳盡、真實的資料。其次是內容全面。突破以往就事論事的做法，將傳統民俗與社會經濟、交通、政治、文化、宗族、姓氏、宗教信仰等因素聯系起來研究，從社會大背景中掌握傳統民俗文化的發展規律，從而得出更為客觀公允的結論。第三是圖文結合。每一篇論文都配有一定數量的插圖，包括地理環境圖與民俗儀式圖等，以增加論文的真實性與形象化。

本論文集共收 12 篇，首篇為概述，扼要介紹平陽、蒼南兩縣的概況。這兩縣原屬一縣，舊稱平陽縣，1981 年始一分為二。本文着重介紹舊平陽縣的歷史、地理的沿革；交通、經濟的結構；人口、方言的特點；宗教信仰與民俗文化的傳承等，旨在顯示其人文地理、傳統民俗的特殊性與從事研究的必要性。以下按專題分為上、下兩編。

上編為“廟會與醮會”，凡六篇，按以下次序排列：第一篇為周干先生著，記述平陽縣城關的廟會與醮會。城關昆陽是浙南的古城之一，自西晉初年建縣開始就被定為縣府駐地。其城并不大，至民國時期全城面積僅 1.3 平方公里，人口僅 13000 余，而古廟宇包括壇、廟、寺、觀，竟達 79 所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建在城西的“溫忠

靖王廟”，俗稱“太保廟”。相傳溫忠靖王俗稱“溫元帥”即為本城白石街人。(10)此街至今猶存。有建于城南的“順懿廟”，俗稱“太陰宮”，供奉陳靖姑，相傳陳靖姑間山學法歸來路過本城嶺門。附近還有一座“天后宮”俗稱“媽祖廟”，建于元至正年間，至今尚存。建于坡南街的“廣福宮”俗稱“東岳觀”，至今已 900 多年，為道教龍門派的聖地。歷來廟會不斷，醮會更盛，本文除一一介紹外，還作了個案的描述與分析。

第二篇為張奮著，記述平陽錢倉鎮城隍廟會。錢倉為平陽重鎮之一，建于五代之前，這裡倚山瀕水，風光旖旎，吳越王錢俶曾游此。北宋乾德三年(965)修建的寶勝寺雙塔至今保存完好，為省級保護文物。錢倉城築于明隆慶五年(1571)，為防倭入侵而建。相傳漢光武帝劉秀于流亡期間曾在錢倉興國寺登基，故本城隍被尊稱為“京城隍”，其建築規格與形製均超越“縣城隍”；又傳本城隍爺實有其人，名陳啓濟，洪武年間進士，曾任福建省寧德縣知縣，生前為百姓做過許多善事，後從道修煉，羽化登仙，被朝廷封為錢倉城隍爺。百姓敬之，有求必應，香火歷來興盛，至今不減。錢倉城隍廟會及出巡規模之大為浙南少有。本文花了極大的精力尋找歷屆廟會的當事人與有關的文物，對 1950 年清明節錢倉城隍廟會的全過程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繪與剖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第三篇、第四篇均為徐兆格先生著，分別記述平陽懷溪鄉垵溪宮五顯爺廟會與論述平陽傀儡戲與廟會的關係。懷溪是平陽縣最古老最偏僻的山鄉之一，歷來交通閉塞，民生貧困，俗稱：“懷溪三樣寶，苦菜吃到老。茅草作板壁，火籠當棉襖。”宗教信仰甚篤，早在五代時名僧願齊即來本鄉穹嶺建普照道場，并在其四周建 18 處寺庵以收留 300 僧徒，吳越王錢俶還下令以平陽一縣賦稅贍養之。當地的百姓最信五顯神靈官華光大帝，因此以五顯爺為主神的垵溪宮終年香火不絕，凡有所求即往問卜，如遇旱災、蟲災或瘟疫，則昇佛出巡，瓊求消災；凡求子得子者，則拜五顯爺為爹，需年年還

“歲願”，直至成人婚配時還大願以告終。求財得大財者，除三牲福禮外，還外加演戲三天，焰火樹一株，更有捐款修理廟宇或重塑金身者。本文所寫為 2001 年元宵節于該廟舉行的五顯爺廟會。與其他廟會不同的是：會期長，歷時三年才完成；祭禮中必有一頭千斤左右的神豬；神豬的飼養、屠殺、擺祭均由神靈決定；外壇千百株“花樹”次第開放引來無數的觀眾，展現出神、人同樂的原始場面與風貌，頗具特色。平陽傀儡戲與泉州傀儡戲并稱于世，源于唐，興于宋，盛于明，至清末民初尚有提錢木偶班 40 多個、布袋木偶班 70 多個、杖頭木偶班 10 多個，藝人達 500 多人。對傀儡戲的研究，雖自孫楷弟以下不乏其人，近人葉明生著作頗豐，然均未論及與廟會的關係，有關傀儡戲與廟會的關係研究，當從徐先生這篇始。本文除了詳細介紹平陽木偶戲與平陽廟會的歷史與現狀外，着重以大量的事實論述了傀儡戲以廟會為載體與廟會借傀儡戲以娛神的密切關係，指出傀儡戲在廟會中形成、傀儡戲在廟會中獲得生存、傀儡戲在廟會中獲得演出場所、傀儡戲在廟會中的特殊地位、不同廟會要求不同的傀儡劇目等，頗多真知灼見，同時還對傀儡戲中神田都元帥作了新的考證。

第五篇、第六篇均為白洪祉先生著，分別記述平陽騰蛟忠訓廟廟會與醮會及普度，二者為姊妹篇。騰蛟為浙南又一重鎮，住民大多為閩南移民。據記載，宋時有鄭姓從福建漳州赤岸遷居于此，明末清初，更有白氏、林氏、蘇氏、王氏等大批閩南移民入徙，乃形成農村小市，經濟發展較快。這裡佛、道皆盛，且與民間宗教相混，統稱佛教。全鎮有宮廟 86 處，寺庵 12 處。忠訓廟始建于宋代，清康熙時重建，主神為薛大夫，故又稱大夫殿，遠近聞名，素有“北港大夫，南港楊府”之稱。廟會期間，浙南各縣以及福鼎等地，民衆商賈紛至沓來，影響所及達于浙南閩北。作者世居騰蛟，從小就是廟會參與者，所記大都為親身經歷，因而讀來特別可信。又因廟會的組織者多為閩南移民的後裔，其規模與演法又多傳自他們祖上，因而

從中可見昔日閩南廟會的遺風及其對平陽固有廟會習俗的影響。關於醮會及普度，作者除詳細記錄遺耗、慶誕、慶揚諸醮及普度道場外，還指出這些醮會、普度與普通廟會的不同之處在於：打破原有的地域與基本信眾的局限，“佑及東西南北中之趙錢孫李周”，因而其規模與影響均要比普通廟會大，如 2002 年 10 月於該廟舉行的“慶誕醮”，其參與捐資者除本鎮外，尚有本縣水頭、山門、鰲江、昆陽諸鎮以及蒼南、瑞安、溫州等縣市，乃至遼寧、上海、湖北、河北、深圳等地的信眾。其影響之大于此可見一斑。

下編為“儀式與傳說”，凡五篇，按下列次序排列：首篇為徐祥地先生著，記述了平陽南雁蕩山朱仙姑信仰的歷史與現狀。南雁與北雁齊名，同為聞名全國的風景名勝區。其開山祖師為五代名僧顧齊，曾率百余徒兒來此分建 18 庵以弘揚佛法，相傳吳越王錢俶還親自帶妃子到南雁拜謁他，並為他修建普照道場及報國寺等。歷代文豪如謝靈運、顧況、朱熹等均有題咏。尤使南雁馳名的是傳說中的朱仙姑，名嬋媛，南雁蘭村人，12 歲出家南雁西洞修道，創立仙姑道派，後得道成仙，西洞乃改名仙姑洞，並建殿塑仙姑聖像以供瞻拜。爾後，聖迹與景觀珠聯璧合，相映同輝，朝拜者絡繹不絕，香火至盛，朱仙姑成為福佑一方的保護神。本文詳盡記錄了南雁的人文地理、仙姑由來與傳說、仙姑信仰的民俗活動，包括仙姑廟會、仙姑道場等，為研究平陽信仰民俗及道教仙姑派提供了豐富的依據。

第二篇、第三篇均為筆者著，筆者原籍亦屬平陽，系本縣懷溪曹門人。分別論述溫元帥與陳靖姑在平陽的傳說、信仰及相關儀式。其中“溫元帥”驅瘟救民的傳說源于平陽，後流布全省乃至江、閩、臺等地。有關“溫元帥”的研究，近人當以康豹與葉大兵為著。康的《道教與地方神信仰——以溫元帥信仰為個例》，借溫瓊的神迹詳盡而準確地論述了道教與地方神信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解決了道教史研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葉的《溫元帥信仰和東岳

會》，則着重探討了溫元帥是如何從泰山神東岳爺衍化而來及其在溫州民間的流傳。筆者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田野調查，又發現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有關溫瓊的神迹、廟宇、驅疫儀式等。如對溫元帥的出生地平陽白石街的考證以及演示溫元帥驅疫的“溫使醮”、“鳴金遣瘟”、“東岳醮”、“普度醮”、“大衍燈”、“開燈道場”等儀式資料，均屬首次披露，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陳靖姑除妖的傳說源于福州占田，後流傳于閩、浙、贛及臺灣等地，尤以溫州平陽為盛，舊時平陽民間凡求子、度關、助產、保育以及祈雨、驅疫等，均離不開這位神靈，平陽鼓詞“娘娘詞”至今尚在民間傳唱不絕。有關陳靖姑的研究，當以福建葉明生為著，除挖掘整理《海游記》外，還出版了《奶奶傳》等多種專著。莊孔韶、葉大兵等人也有涉及。筆者則獨辟蹊徑，長時間深入民間考察，除發現自宋代至今陳靖姑作為閩山派教主在平陽的種種神迹外，還對至今尚在民間流傳的閩山派道士班所做的“度關”、“皇君落場”、“娘娘醮”等陳靖姑降妖儀式予以實錄與剖析，為陳靖姑與閩山道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最後兩篇均為金亮希著，分別記述蒼南縣蒲城鄉的姓氏文化與“拔五更”儀式。蒲城位于蒼南縣最南端，與福建沙埕鎮接壤，靠山面海，歷來為兵家必爭之處，自唐代開始即成為海防戍守要地，宋設寨，明築城以防倭。蒲城築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為朱元璋第 59 所衛城，城周長 2.4 公里，高 5 米，城堞 611 口，敵臺 6 座，窩鋪 22 座，是全國極少見的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抗倭城堡，屬國家級文物。蒲城雖小，據 2000 年統計，全城只有 7236 人，姓氏却有 88 個之多，這在全國也屬罕見。其中土著人口不多，大多為來自福建、山東、安徽、江西等地的移民，其中又以福建尤其是閩南人居多。這裡方言衆多，曾有閩南話、客家話、畬族話、金鄉語、甌話等十多種，不同人群的交流只能用普通話。現主要為閩南語與甌語兩種。作者身為蒲城鄉副鄉長兼蒲城文保所所長，對蒲城的姓氏文化十分關心與熟悉，因而對全城 88 個姓氏的來源、興衰、支

派、人丁、分布以及他們的祠堂、祠產、宗族、宗譜、族規、家訓、婚配、祭祠等，均作了詳盡的考證，為中國的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殊為難得的案例。“拔五更”是蒲城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慶，也是蒲城特有的民間習俗。從正月初四始至正月十九止，長達 16 天，大多數日子都敲鑼打鼓放鞭炮抬着海神晏公爺神像出巡，整個蒲城處于一片狂歡的狀態。其高潮是在元宵節夜晚，城內東廟西殿所有晏公爺神像都抬出來，穿行在大街小巷以驅邪辟祟。辟祟之後，幾百條光着身子的好漢吶喊着一齊上陣“搶杠”，自然是狂歡之巔。這一夜，炮聲如雷，火光冲天，通宵達旦，全城不眠。作者年年身歷其境，本文所記則是 2002 年“拔五更”的全過程，包括“拔五更”的由來、晏公爺的傳說與信仰、晏公出巡、“搶杠”、“搶紅”、“游四門”、靈感、禁忌等等，均屬現場實錄，保存原汁原味，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民間習俗田野調查報告。

總之，這是一本由當地學人撰寫的民俗文化研究論文集，作者們繼承我國“采風”傳統，憑借“田野調查”及其采集方法，經過多年的實地調查與采錄，在獲取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完成的，因而顯得特別可靠、豐富和鮮活。我們希望通過這本書，吸引更多的學者加入這個隊伍，以期有更多更優秀的作品面世。

INTRODUCTION

Paul R. Katz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While a growing number of scholars in Asia and the West have begun to research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us traditions, relatively few have done so by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extensive reading in historical sources with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this book, a broad range of scholars and local experts have utilized these methods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religion and ritual have both reflected yet also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Zhejiang. The papers presented here represent the fruits of our participation in a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organized by Professor John Lagerwey and funded by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entitled "Relig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Economy in Southeast China". Our project has focused on three Zhejiang counties: Cangnan 蒼南 and Pingyang 平陽 in the south and Tiantai 天台 in the north. The results are now being publish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ographs of our new Series on Traditional Society in Zhejiang (Zhejiang chuantong shehui congshu 浙江傳統社會叢書). This book, which has been edited by Xu Hongtu 徐宏圖 and myself, is about religion and loca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Pingyang County (after 1981, sub-divided into Pingyang and Cangnan counties). The second book, edited by Lian Xiaoming 連曉鳴 and myself, is about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iantai county. The third book,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2005, is a study by Xu Hongtu of Zhengyi 正一 pudu 普渡 rituals in Cangnan.

Our research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method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at have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com-

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scholars have moved from top – down analyses of the state's impact on local society to detailed ethnographic or microhistorical case studies of the actual functioning of local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the roles of local elite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networks of power.^① At the same time,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society has broadened to encompass the key role of religion, thereby moving beyond post – Enlightenment bifurcations of scholarship into “religious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② These approaches have shed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Daoism and 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③ broad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s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era,^④ and elucidated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religions have grap-

① For an overview of these issues, see Catherine Bell,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Popular Relig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29.1 (1989), pp. 35 – 57.

② While the current Chinese term for “society” shehui 社會, is borrowed from the Japanese shakai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Meiji 明治 era (1868 – 1912)),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erm shehui could refer to local cults, and can be liter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ssociation of the earth/territorial deities”.

③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Robert Hymes,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④ Guo Qitao 郭啓濤, *Exorcism and Money: The Symbolic World of the Five – Fury Spiri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55 (Berkele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3); Kang Xiaofei 康笑菲, *Power on the Margins: the Cult of the Fox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North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 – 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aniel Overmyer,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ir Shahar and Robert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1992); Barend 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E. J. Brill, 1998); 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Yu Chün – fang 于君方, *Kuan – yin 觀音: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Zhao Shiyu 趙世瑜, *Kuanghuan yu richang: Ming – Qing yilai de miaohui yu minjian shehui 狂歡與日常: 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 (Beijing: Sanlian shidian, 2002).

pled with in the modern era.^①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has been transformed as well, with scholars effectively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to conduct in – depth research in Fujian 福建 and Guangdong 廣東,^② as well as in Taiwan.^③

Two long – ter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 particular have marked the progress being mad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ocal society and its 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 The first is the Monograph Series of Studies in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Minsu quyi congshu) 民俗曲術叢書, 80 volumes, edited by Professor C. K. Wang

① Prasenjit Duara, Wenhua, quanli yu guojia 文化、權力與國家, translated by Wang Fumin 王福民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1994); Thomas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Vincent Goossaert, ed., L'Anticléricalisme en Chine, Extreme Orient, Extreme Occident, 24 (2002). See also a special issue of The China Quarterly edited by Daniel L. Overmyer, entitled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volume 174, June 2003).

② Kenneth Dean, 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Kenneth Dean,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Xu Xiaowang 徐曉望 Fujian minjian xinyang yuanliu 福建民間信仰源流 (Fuzhou: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1993); Zheng Zhenman 鄭振滿 and Chen Chunsheng 陳春聲, eds., Minjian xinyang yu shehui kongjian 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2003). See also the new journal Lishi renleixue xuekan 歷史人類學刊 jointly published by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 in Guangdong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學).

③ Chang Hsun 張珣 and Jiang Tsann – terng 江燦勝, eds., Taiwan bentu zongjiao yanjiu daolun 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Chang Hsun 張珣 and Jiang Tsann – terng 江燦勝, eds., Taiwan bentu zongjiao yanjiu de xin shiye han xin siwei 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3); Philip Clark and Charles B. Jones, eds., Religion in Modern Taiwa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David K. Jordan and Daniel L.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aul R. Katz & Murray A. Rubinstein,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Donald Sutton, Steps of Perfection: Exorcistic Performers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Twentieth – Century Taiwan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bert P.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